



刘爱玉,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副主任。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袁方教授;1999年师从王思斌教授攻读组织社会学方向博士学位。1990年留校任教,曾于1997年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访学。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副理事长、婚姻家庭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监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性别与劳动。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核心关注了制度变革及其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权益与市民化、转型过程中的劳动与性别、市场化转型与地位获得等议题。曾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北京大学第十二届“十佳教师”、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多个奖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污名化与合法化: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

毛丽丹,刘爱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具体展现了家政学内在的合法化和污名化基础,对家政学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当前家政学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家政学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四个时期,即在清末时期和民国时期从外来移植到本土化,这时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分庭抗礼,在新中国初期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受到革命性批判,学科发展中断,至改革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SH080)

作者简介:毛丽丹,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2024-01-08

修回日期:2024-02-11

** 通讯作者:刘爱玉, E-mail: liuay@pku.edu.cn

DOI: 10.20181/j.jzsk.jlau.240001

开放后商业化职业主义兴起,学科恢复重建。西学为用、科学家政、科学生活的知识观,兴起女性教育、培养女性精英的性别观,强国强种、社会服务、经济价值、社会建设的公共性职业伦理指向,构成了家政学在不同时期的合法化基础。经验主义的知识观,培养贤妻良母、性别化的性别观,家庭私领域、阶级特权、私人化的非公共性职业伦理指向,构成了家政学在不同时期的污名化基础。当前,我国家政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需要基于新的职业主义来实现去污名化并夯实学科合法性,即在知识观层面以专业化和知识整合破除经验主义污名,在性别观层面以性别敏感教育破除性别化污名,在职业伦理层面以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职业价值破除私人化污名。

关键词: 家政学; 职业主义; 职业污名; 职业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4078(2024)01-0027-10

引用格式: 毛丽丹,刘爱玉. 污名化与合法化: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J]. 家政学刊, 2024,1(1):27-36.

近年来,与“大学毕业做保姆”“家政学本科生”相关的话题频频引发社会热议。尽管吉林农业大学在2003年就开设我国首个家政学本科专业,部分大众至今仍然认为从家政学毕业等于当保姆,或者在本科院校中培养所谓“高学历保姆”没有必要^[1]。2021年,河北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全国首批家政学硕士研究生,6名家政学硕士研究生正式入学,家政学再次出现在新闻热榜并遭遇非议^[2]。所谓“大学毕业做保姆”等话语包含了对家政学的多重污名,即“做家政不需要在大学学习”的经验主义污名、“家政是家庭内部之事因而社会价值不高”的私人化污名以及“保姆”背后所隐含的“家政是女性之事”的性别化污名等。

对家政学的这些污名化认知与家政学的学科定义相差甚远。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家政”指家庭事务的管理工作,如有关家庭生活中烹调、缝纫、编织及养育婴幼儿等。“家政学”译自英文“Home Economics”,直译为家庭经济学,包括有效地利用家庭的各种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家政与经济的讨论古已有之,英文中的“经济(economy)”一词在词源上便来自于古希腊的“oikonomia”,由家庭(oikos)和礼法(nomos)构成,意为家庭管理术或家政学^[3]。对于家政学的现代定义,有学者总结了四种观点,分别是技能说(持家的能力和知识)、应用说(科学与艺术研究成果的应用)、关系说(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目的说(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提出了一种文化说,即家政学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研究人类生活方式的文化现象,通过研究人们在家庭中的日常生活,以帮助人们改变经验性、重复性的传统生活方式,建立起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主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从而促进人自身的现代化^[4]。

文化说的定义突出了家政学的文化性、历史性和现代性。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家政学研究和探索家庭生活的规律、管理方法和操作技巧,是以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家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等,其教育对象从女子扩展到全民^[5]。这强调了家政学的公共性、科学性和综合性,隐含了性别观念的现代化对家政学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比较认同这两种定义,认为家政学具有现代性、文化性、公共性、综合性等特点。

那么,家政学为何会被质疑为不属于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范畴,究竟是解放女性还是束缚女性,最终指向私人性还是公共性的职业伦理呢?诸多争议需放到家政学的职业主义建构历程中进行澄清,但国内学界目前对此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旨在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梳理我国家政工作从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的经验主义到以抽象知识为基础的职业主义的建构过程,家政学从外来移植到本土化改造、从学科中断到学科重建的历史过程中所蕴含的职业主义论争。这一梳理将有利于厘清我国家政学的内在历史发展脉络,对探寻当前家政学污名化和合法化的历史基础和发展路径具有启示意义,为家政学的未来发展定位提供重要的理论性和方向性参考。

一、职业主义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职业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关于职业主义的分析框架。首先,职业社会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达到黄金时期,大约奠定了该领域作为独立社会学门类的理论基础^[6]。“职业”(profession,有研究译为“专业”)的定义充满分歧,在英语、德语、法语等不同文化语境中具

有不同含义,这对职业研究产生了很大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刘思达认为可以将“职业”视为一种符号意义,指职业自主性和社会声望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的行业;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成为职业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它重点关注职业化过程中知识的作用以及使某些行业团体垄断其专业化技能的社会条件,由此产生了功能学派、结构学派、垄断学派和文化学派四种理论视角;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着职业地位、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等概念引发了一系列重要辩论,同时,“职业化”范式因其过于关注职业内部性且职业本身难以统一定义等原因而受到猛烈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是阿伯特的职业系统理论^[7]。阿伯特将职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注重分析职业间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尤其是关于管辖权(jurisdiction)的争夺——“管辖权”是“职业和工作之间的联系”^[8],即职业对其工作的合法性控制权^[9]。阿伯特认为,抽象知识是有效界定职业的基础,向极端抽象和极端具体之间的均衡状态或最优抽象水平发展,有效的管辖权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容抽象性否则会被视为手艺知识(craft knowledge)而不具备职业合法性或容易招致外部力量的攻击,但过于抽象的形式主义知识也会使得适用对象变得狭窄、管辖权被弱化^[8]。可见,知识对于职业本身意义非凡,职业内部的知识观是职业主义宣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职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其次,职业本身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经历了多重变迁,当代职业逐渐走向多样化、全球化、本土化、管理化和数字化,这标志着重新思考职业的迫切需要^[10]。有学者在结合既有研究分类的基础上,划分出职业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学院型(collegiate)、组织型(organisational)、企业型(corporate)和自雇型(self-employed),并对这四种职业的知识体系和合法性来源等重要特征进行了对比^[11]。同时,不少研究将组织中的职业视为一种糅合了“组织管理主义”与“职业主义”的“混合型职业”,比如企业组织^[12]和公共组织^[13]中的职业。家政职业根据其是否被组织雇佣可以被归属为混合型和自雇型,与这些类型的职业一样,家政职业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知识观和合法性上的争议,以及组织管理主义与职业主义、商业性与社会性的职业伦理之争。

英国学者杰拉尔德·汉隆(Gerard Hanlon)对于职业主义的分析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发。鉴于各

种职业或工作争夺专业性和社会控制的斗争持续存在,汉隆并未给职业和职业主义一个普遍性的学术定义,而采用其社会含义,即诸如法律、医疗、教育、社会工作等通常被视为专业性的职业或工作;围绕职业主义意指为何这一问题而持续进行的意识形态或职业理念斗争,包括由谁控制不同职业和职业者,怎么样对职业者做出评价,职业者的功能为何,他们该如何提供服务、获得多少报酬等;通过分析英国律师职业的发展历程,汉隆认为职业主义经历了从“绅士型(gentlemanly)”到“社会服务型(social service)”再到“商业化(commercialized)”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与英国的市场—国家关系自19世纪以来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到福利国家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14]。(1)“绅士型职业主义”,又称为职业个人主义,指职业以一名“绅士”(包含男性化的性别观)所应具备的特征为基础,为有钱有权者服务,以社会声望为主要手段来维持或提升阶级地位。鉴于清末民初家政以女性为主、注重家庭主义和社会声望的传统主义特点,这一时期家政学的职业主义内涵可称为“贤妻良母职业主义”。(2)“社会服务型职业主义”,其职业理念是以社会公民身份为基础、为需要者提供社会服务而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报酬,公共服务和客户福利而不是自我利益成为职业人士的指路明灯。这与福利国家的支持有关。例如,家政推广项目便符合这一特点,体现了利他性和公共性的职业伦理。(3)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职业工作明显变得商业化,产生了“商业化职业主义”,即具有商业意识、受客户驱动、强调支付能力和盈利能力。在灵活弹性政体下,职业者越来越需要具备商业导向、创业技能以及重要性相对降低的专业技术能力。家政学在我国当前的发展也蕴含了明显的商业化趋势,面临商业效益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职业伦理冲突。

笔者认为,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表现在两个方面,蕴涵着职业的合法化基础和污名化基础。一方面,从占据主导地位的职业理念或职业意识形态而言,我国家政学职业主义包含贤妻良母职业主义、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以及商业化职业主义三种理想类型,其历史论争在改革开放前以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之争为主,在改革开放后以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与商业化职业主义之争为主。另一方面,从内容构成而言,职业主义主要包含了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三部分,它们在每个

历史时期分别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

二、美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发展历程

为响应妇女走出家庭、提高社会地位的需求,现代意义上的家政学学科最早在美国创立,家政工作经历了从经验主义到职业主义的发端。在家政学学科建立之前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早期女权主义者便在美国的女子学院中开设了与家事相关的课程^[15],但家政学的学科化进程一直遇阻。直到19世纪后期,持家学(Domestic Science)、家事经济学(Domestic Economy)等课程或学位项目才在美国大学中发展起来^[16]。在1899—1908年的一系列普莱西德湖会议上,家政学的专用名词正式确定为“Home Economics”,标志着家政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7]。

建立初期的家政学带有明显的社会改良色彩,家政学家希望将日常家庭生活科学化,使家政从经验主义走向职业主义,来帮助女性突破贤妻良母的家庭内部角色、走向社会,并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发展。一战后到1950年,美国家政学进入扩张期,发生知识转向,社会文化派的家政学家开始反思科学管理学派和性别化教育的弊端,关注点从客观环境转移到精神心理层面,因而出现基于技术理性的科学性知识和基于人本精神的规范性知识^[18]之争,从性别化教育走向性别中立教育的趋势也初见端倪;

1951—1980年,激进女权主义对家政学在性别化教育上的保守倾向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家政学内部也面临过度专业化的知识分裂困境、商业效益与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争议,于是,家政学家通过公共关系项目、理论基础重整、学科命名变化、性别比例调整等策略来争取学科合法性;1980年以后,家政学争取合法性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包括在性别观上突破了传统性别分工框架,逐渐走向性别敏感教育,在人类生态学的知识整合框架中找到了个人、家庭与社区的系统联系,在职业伦理上构建出了面向资源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类生活基本需要、促进人类个人家庭福利与社会服务等社会性理念等^[19]。

从美国家政学的大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表1),家政学职业主义内涵经历了从基于经验家政观的经验主义到基于科学家政观的职业主义建构,在知识观上面临着科学管理派的科学性知识和社会文化派的规范性知识之争和专业化分工程度加大后的知识分裂与知识整合之争,在性别观上经历了从培养“贤妻良母”的保守女权主义到赋能女性“走出家庭”的激进女权主义以及从性别化教育到性别中立教育再到性别敏感教育的转变,在职业伦理上面临着私人性与公共性和社会道德与商业效益之争。这对于分析我国家政学发展历程中的职业主义历史论争及其当代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发。

表1 美国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发展历程

时期	知识观念	性别观念	职业伦理
学科初创期	从经验主义到职业主义	从贤妻良母到走出家庭	私人性与公共性 社会道德与商业效益
学科扩张期	科学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	性别化与性别中立	
学科分化后	知识分裂与知识整合	性别中立与性别敏感	

三、我国家政学的发展历程与职业主义历史论争

我国家政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四个时期,即清末时期和民国时期家政学从外来移植到本土化,此时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分庭抗礼,新中国初期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受到革命性批判,学科发展中断,改革开放后商业化职业主义兴起,学科恢复重建。每个时期的职业主义论争从构成内容来看主要包含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三方面,它们构成了家政学合法化和污名化的重要基础,详情如图1所示。下文将对此展开具体论述。

(一) 从移植到本土: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之争

家政学在我国的早期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深陷民族危机、急需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多方移植而来的差异化家政学理念及其与本土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家政学内部蕴含着具有多重矛盾的职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矛盾主要表现为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之争。

1. 多方移植下的家政学职业主义及其本土化改造

清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直努力探索“西学为用”,以期化解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

之困。家政改良与“废缠足”“兴女学”一同成为当时妇女解放甚至民族解放的重要部分。清末民初的家政学主要从日本和美国移植,日本家政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书籍翻译、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回国任教等,我国家政学向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在美国

学习家政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中国办学和推广家政教育的美国教育家、传教士。日本的家政学主要体现为国家主义和贤妻良母职业主义,美国的家政学则主要体现为实用主义和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二者具有较明显的理念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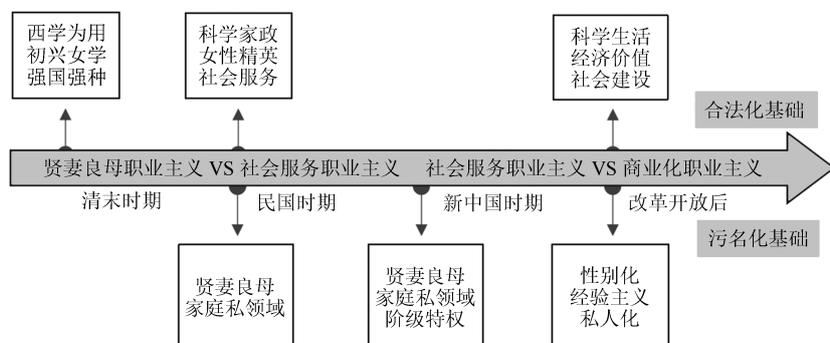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家政学的职业主义历史论争及其合法化和污名化基础

日本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引入家政学,于1899年设立有关家政教育的技艺科,于1901年创立家政科^[20]。1902年,日本学者下田歌子的《家政学》被翻译至中国,日本家政学中的国家主义和贤妻良母理念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家伦伦理和性别观念比较契合,一度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备受推崇,不久后,伴随着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到来,国人逐渐放弃学习日本转而大幅度向美国学习,美国当时的家政教育理念提倡民主化、科学化、生活化、实用化^[21],并盛行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但中国的家庭制度、社会习俗文化与美国相差甚远,移植而来的家政学需要加以本土化改造。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后文简称“女师”)和燕京大学(后文简称“燕大”)是我国较早设立家政学科的两所代表性高校,其家政学的发展展现了从日美学习移植到本土化改造的过程。1916年初,留学日本的齐国樑(1883—1968)经电调回国,被委派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女师前身)校长,齐国樑从日本带来的女子师范教育理念和举办家政学科的终身理想得以实施。该校于1917年设立家事专修科,于1929年更名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首设家政系并开始招收大学本科生,家政系办学至1949年,20年共培养213名家政学科本科生^[22]。期间,齐国樑于1921年留学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研究,1925年回国复任女师校长。同样留美归国后任教于女师家政系的还有我国现代大学最早女教授之一王非曼(1897—1977)等人,那

时女师家政系在全国声名远播、影响很大^[23]。可见,女师家政学的发展深受日本和美国家政学的影响。

据《燕京大学史稿》记载,燕大家政系于1922年设立,于1951年被撤销,详情如下^[24]。燕大家政系设置的最初宗旨是培养具有家政学各方面科学知识以及具有社会服务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以提高家庭组织和家庭功能的质量,达成促进社会发展之目的。1922年,美国Oregon农业大学家政学院院长米兰(Ava Mylam)偕其学生必乐施(Camilla Mills)来中国进行家庭调查,于当年在燕大建立家政系。随后,逐渐考虑到中国的家庭制度和习俗与美国迥异,不宜于全盘照搬,乃于1926年秋聘请何静安来校任教,后担任系主任。何静安为本校理科毕业生,曾赴美攻读家政学,侧重以美国家政学原理与中国状况相结合,试图建立切合中国实际的家政学。1931年,陈意任系主任。陈意是家政系1926年的第一届毕业生,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家政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校任教。陈意任系主任后设立了营养学和儿童发展学两大专业,强调面向社会、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据粗略统计,燕大家政系共培养了约80人,毕业于营养专业的约占80%,毕业于儿童发展专业的约占20%。家政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成长为具有较强事业心的职业女性。营养专业的毕业生大都成为医院正规的营养师,陆续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医院并创建了临床营养业务部门或营养科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大力提倡儿童保健事业,修习儿童发展专业的毕业生大都在本

领域工作中担任领导和指导工作。改革开放后,相关毕业生依然在本领域发光发热。此外,家政系毕业生们还积极宣传普及营养学和儿童教养及保健的知识,如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工具进行了大量的科普工作。整体而言,燕大家政学的发展受美国家政学的影响较大,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导向。

2. 清末民初家政学职业主义中的知识观、性别观与职业伦理

家政学能够在清末时期发端发展,与科学理性知识在当时有着极高合法性密切相关。20世纪初家政学的引入,反映了当时中国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家庭观念与知识传统的转变。代表西方现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家庭意识形态为知识阶层提供新的家庭观念与知识图景,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庭”是一种科学、合理与秩序化的理想家庭,同时,现代家庭也被构建为女性可以获得社会性价值的全新空间^[25]。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深深植根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潮流,同时民族解放又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妇女解放。因此,清末时期家政学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便在于其职业主义内涵,即占据主导地位的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西学为用”中的科学知识,代表妇女解放的“初兴女学”以及“强国强种”的公共性职业伦理。

这三种职业主义内涵的合法化过程表现之一便是上海家政改良会。1906年,受日本家政学的影响,“家政改良会”在上海竞化师范女学校成立,由名流绅商赞助经费,这些绅商赞同“欲图强国,必先强种”,认定通过“兴女学、改家政”来培养“贤母良妻”和“整顿家庭”是救国途径之一,体现了时人“为国改家”的公共性关怀;家政改良会由名流绅商的夫人及一些女界名流组织具体活动,在一年半内面向社会举办了41次讲演,主讲者约有30位女性,正因如此,一批绅商夫人与女校毕业生得以“离家为国”,进入社会公开发声,为民国家政职业化与家事社会化等问题的讨论奠定了一定基础;至1907年,清政府在《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设立“家事”科,“家政/家事”成为初兴女学的必备内容,从制度上使原本在家庭内口耳相传的“齐家之务”得以通过学校教育体系传授,这也标志着家政自此从家庭正式进入了社会^[26]。

清末民初的家政学从外来移植后,继承了中国传统女学的部分思想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各级教

育系统中家政学的主要培养目标变成贤妻良母。此时的家政学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色彩,但只学到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在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上大大减弱,加上当时社会战乱不断,只有少数精英家庭的女性才有受教育特权,家政学最终沦为“资产阶级阔太太的学问”^[27]。在民国早期,包括家政学在内的女子教育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进行了批判反思,虽然这种反思并不彻底,但也推动了家政学职业主义的性别观论争——家政学培养目标是贤妻良母还是女性精英。这一时期主要推行性别化的高等教育,推崇沿袭传统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贤妻良母主义女子教育,后来在男女平等思潮的影响下弱化了“贤妻”而强调“良母”,例如《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规定“母性主义”为女子教育之宗旨^[28]。至民国中后期,部分推崇更为激进的妇女解放观的女子大学因不满于家政学培养贤妻良母而拒绝开设家政学专业,家政学的学科合法性饱受质疑。随着民族危机逐渐加重,激进革命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呼唤更加性别平等的家政学高等教育。

在性别观论争愈演愈烈、家政学合法性弱化之时,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中的公共性职业伦理为家政学的合法性奠定了重要基础,促进了家政学的发展。例如,抗战时期,河北女师西迁陕甘并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继续办学时,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鼓励师生主动投入到大西北的建设中,此时的家政系学生们秉持社会服务意识,开办家事讲习班,举行家事讲演会,建立教育实验区,积极宣讲家政教育,促进了广大妇女及普通民众思想意识的解放,为西北地区家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9]。1940年,金陵女子大学从因反抗将女性限于私人领域而多年拒开家政系,转变为同意开设家政系,但重在通过家政科学化、社会化的路径打入公共领域,强调将家政学纳入民族国家的需要,培养家庭科学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服务社会,而非采用“夫本位”或“子女本位”式的训练,这使金陵女子大学家政学的毕业生参加到乡村重建、儿童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社会的公共性工作中^[30]。

因此,在民国时期,家政学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在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具体包括科学家政的知识观、培养女性精英的性别观以及社会服务导向的职业伦理。其污名化基础则在于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具体包括培养贤妻良母的保守性别观和指向家庭私领域的职业伦理。

(二) 从中断到重建:贤妻良母职业主义批判与商业化职业主义趋势

在中国革命中,妇女问题总是与阶级问题相提并论的,女性解放一直被视为终结阶级压迫、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3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男女都一样”成为社会主流性别话语,性别化教育传统基本被否定并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体系之外,性别中立教育传统则得到了弘扬,为女性接受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社会条件^[25]。在这种语境下,激进革命主义对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和“资产阶级阔太太的学问”进行猛烈批判并取得胜利,学习家政学被认为是束缚女性的时代退步,是回到私人领域做家庭妇女而非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家政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调整中被撤销。总之,在新中国初期,家政学的污名化基础主要在于贤妻良母职业主义,具体表现为培养贤妻良母的性别观以及指向家庭私领域和阶级特权的职业伦理。

改革开放后,家政学在社会转型尤其是家庭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迎来了恢复重建。家庭变迁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现象,我国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人口转变、观念转换的现代化大变革时期,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更是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家庭面临着深刻的转型危机^[32]。改革开放后的家政学学科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以非学历教育为主的探索恢复期(1978—1990年)、进入高等学历教育体系的发展重建期(1990—2012年)、国家出台文件支持家政行业及其人才培养的规范化发展期(2012—2019年),以及国家鼓励高校设立家政专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新阶段(2019年至今)^[3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家政学作为一门立足于现代化家庭文明建设的学科,有助于帮助人们掌握科学化、现代化的家庭生活方式。因此,党和国家在新时代鼓励支持高校开设家政相关专业,并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家政服务产业的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在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家庭生活质量备受重视以及国家政策支持行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家政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也面临来自传统的制约和新时代的挑战。一方面,家政学从近代以来便一直面临性别观和职业伦理上的内在冲突与外

部质疑,传统的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使得关于性别化、私人化的职业污名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当代社会,学科过度分化带来的知识分裂困境阻碍了家政学的知识化进程,从反面强化了家政学中本就存在的经验主义污名。同时,在市场化浪潮中,家政学的经济效益至上理念会导致社会价值逐渐式微,进一步加强私人化的职业伦理污名。

因此,从改革开放至今,家政学的合法化基础和污名化基础交叉体现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和商业化职业主义趋势之中。其合法化基础具体表现为科学生活的知识观,家政产业化背后的经济价值导向和社会建设导向的职业伦理,其污名化基础则具体表现为性别化的性别观、经验主义的知识观,以及私人化的职业伦理。

四、去污名化:基于新的职业主义夯实学科合法性

从我国家政学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其职业主义的历史论争主要体现在贤妻良母职业主义与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之间、社会服务职业主义与商业化职业主义之间,在具体内容构成上表现为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三方面。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后,每一时期的家政学职业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意涵,体现了家政学合法化和污名化的重要基础。本文对家政学职业主义内涵的梳理有利于厘清家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家政学的未来发展定位提供重要的理论性和方向性参考。

我国家政学和世界家政发展趋势^[34]一样,在当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机会,对家政学相关职业的通才和专才的需求将继续增长,但亟需借助新的职业主义来破除经验主义、性别化和私人化的多重职业污名,同时需要注意学科分化后的知识整合以及商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内在冲突的化解,如此才能确立家政的职业合法性并使之获得长效发展。换言之,家政学的去污名化需要基于新的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来夯实家政学的学科合法性。

(一) 以专业化和知识整合破除经验主义污名

在知识观层面,家政学若要破除经验主义污名,需加强专业化科学知识的教育、科研和推广,这种专业知识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并需兼顾应用性和理论性。在当前学科分化和知识分裂的背景下,需要采用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知识整合视角来重建家政学的

理论基础和专业化知识体系。

早在燕大时期,陆志韦校长在1950年的一次教学经验总结上便对于家政系的发展提出了富有远见的设想。他指出,“我们不应培养普通的托儿所工作人员和对食物化学知之甚微的美食家……我们的目标在于培养关于儿童发育和食物化学的科学工作者和这方面的带头人……把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结合起来……按照这个系的新功能重新考虑系名”^[35]。这一设想由于后来的学科中断而未能实现,但对当下家政学的知识整合却有所启迪,即既要注重对家政学专业化知识的研究,又要推进跨学科知识在家政领域的重新整合。

跨学科的知识整合亦是国际上家政学的重要发展方向。2008年,正值国际家政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ome Economics)组织成立一百周年,其智库委员会提出了“21世纪的家政”宣言,指出家政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和专业领域,要基于关怀、分享、公义、责任、沟通、反思的专业伦理,透过跨学科的专业投入,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技术等不同层面来达成个体、家庭、社区的理想和可持续生活之目标,而家政的本质则包括关注个体和家庭的需求及实践,跨学科整合知识、过程和实践能力,以提升个体、家庭、社区的福祉^[36]。

超学科则是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超学科更强调超越学科的边界以及学术界,因为家政领域知识的复杂性要求每个人都参与问题的解决,联系更多学术界之外的人来促进问题的解决;跨学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包括了两种及以上学科知识的整合,并形成新的用来解决人类问题的知识,可能会创造新的专业领域而非去专业化;超学科视角可以让家政学家超越学科边界,整合理论、政策和实践,综合学术界、高等教育、社会大众和其他部门的力量来共同解决人类家庭生活问题^[37]。

(二) 以性别敏感教育破除性别化污名

在性别观层面,家政学需要以性别敏感教育破除性别化污名和性别中立弊端。从性别教育传统的发展历程来看,性别敏感教育形成于对性别化教育和性别中立教育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之上。性别化教育容易带来性别歧视、学科发展受限等多种弊端,但可取之处是充分重视男女社会性别的差异。性别中立教育值得弘扬之处是基于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论来打破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界限,并坚持为男女两性提供相同的教育,却忽视了性别差异尤其是

女性特点。

因此,需要对性别化和性别中立教育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性别敏感论便是如此,即完整的人应当是同时拥有男女两性优秀品质与能力的人,能通过吸纳异性的价值而超越传统的陈规陋习,将男女两性的优秀品质融汇于理想的人性之中^[26]。家政学既不能采取性别化教育,只针对女性教学或培养家庭私领域内的贤妻良母,也不能完全漠视男女性别差异,而应该综合男女两性的特点和优势来培养全方位的人才。

(三) 以公共性和社会性价值破除私人化污名

在职业伦理层面,家政学需要以公共性和社会性价值破解商业化矛盾和私人化污名。社会服务职业主义曾是家政学获得社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当前也应该充分弘扬这一传统,让家政学超出家庭私领域的刻板印象,发挥本自具足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价值,比如传播科学家政理念、推广应用性家政知识等。在当前数字化时代,可以借用数字科技来扩展家政推广的可及性和成效性。例如可运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新型大众化传播媒介,建立易学可及、分享交流的家政推广平台,让数字技术赋能家政推广和家政发展。

美国家政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商业世界中找到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急于吸引女性消费者的公司聘请了家政学家担任消费者关系、市场营销、产品开发、产品测试和演示等职位,而家政学教育促成了家政的职业理想,将家政学家与只关心销售的广告商和没有大学学位的家庭主妇区分开来,家政学家借助商业化趋势成功建构出了有意义的家政职业生涯,并塑造了美国工业中消费者教育的制度化^[38]。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家政学也面临职业伦理困境,在企业利润和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协调不太成功^[39]。

与美国家政学在商业化世界中占据了社会合法性相比,我国家政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而可以将商业消费研究作为发展方向之一,同时注重在目前蓬勃发展的家政产业等商业化领域中建构出新的社会性职业伦理,以夯实家政学和家政职业的社会合法性。

五、未来研究展望

纵观全文,本文借鉴了汉隆的职业主义分析框架来阐释家政学的历史发展,反之也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修正这一理论分析,即职业从职业个人主义到社会服务职业主义和商业化职业主义的转变,并不只受国家—市场关系的影响,还会随着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性别观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例如,我国家政学在民国时期被部分女子大学拒绝开设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科中断表明,性别观念可以对职业主义产生独立于国家—市场关系的影响。另外,职业化和职业主义分析范式虽然被后期的职业社会学家批评过于关心职业内部因素对职业发展的影

响,但是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作用。

本文仅从历史和理论层面推导出家政学职业主义的历史变迁对于家政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后续的实证研究可以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当代家政学的职业主义话语建构及其职业化效果,也就是去污名化或合法化效果,如分成哪些类型的话语,如何划定和整合家政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边界等,尤其是可以关注知识观、性别观和职业伦理层面的职业主义话语。

参考文献:

- [1] 巩持平. 家政学本科生≠高学历保姆[N]. 解放日报, 2022-11-02(16).
- [2] 陈曦. 家政学是培养“大学生保姆”吗? 你想简单了![N]. 工人日报, 2021-09-13(6).
- [3] 叶仁杰. 从家政到经济的概念历程[J]. 中国图书评论, 2023(2): 54-64.
- [4] 陈朋. 我国家政学学科发展研究——现代性的视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4.
- [5] 钟玉英. 家政学[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4-5.
- [6] 郇菁. 职业研究的历史性: 从修正论、知识论到再历史化[J]. 广东社会科学, 2020(3): 204-216.
- [7] 刘思达. 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究, 2006(1): 197-221.
- [8] 安德鲁·阿伯特. 职业系统: 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M]. 李荣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39, 93-95, 156-160.
- [9] 刘思达. 割据的逻辑: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44.
- [10] Burns E A. Theorising professions: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1-5.
- [11] Cross D, Swart J. Professional fluidity: reconceptualising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self-employed neo-professionals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21(11): 1699-1720.
- [12] Hodgson D, Paton S, Muzio D.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Competing logics and the hybrid nature of new corporate professions[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4): 745-759.
- [13] Noordegraaf M. Hybrid professionalism and beyond: (new) forms of public professionalism in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contexts[J]. Journal of Professions and Organization, 2015(2): 187-206.
- [14] 杰拉尔德·汉隆. 律师、国家与市场——职业主义再探[M]. 程朝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9, 212-216.
- [15] Nancy F C.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articles on women's lives and activities[M]. New York: K G Saur, 1993: 48-69.
- [16] 周文建, 庞大春. 我国家政学新编[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 6.
- [17] 钟玉英. 家政学[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9-10.
- [18] Terence C H. Knowledge mandates: collective influence by scientific, normative and syncretic professions[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3): 421-447.
- [19] 陈朋. 我国家政学学科发展研究——现代性的视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3-71.
- [20] 杨健美.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校家政系家政教育发展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11.
- [21] 戴宇龙. 20世纪初日美家政学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以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家政教育理念与哥伦比亚大学家政教育理念为例[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1(1): 33-37.
- [22] 邱士刚. 民国时期家政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为例[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 17(5): 39-44.
- [23] 王淑红, 邓明立.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史略[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2(3): 31-36.
- [24]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 燕京大学史稿[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272-285.
- [25] 樊洁. 性别图景与家庭想象[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3: IV-V.
- [26] 王晓慧. 清末上海家政改良活动研究——以1906—1908年竞化女校的家政改良会为中心[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5): 80-97.
- [27] 周小李, 杜时忠.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教育传统及其超越[J]. 教育研究, 2008(10): 33-38.

- [28] 陈朋. 美国家政学学科发展研究——现代性的视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90-191.
- [29] 王永颜, 韩旭帆. 西迁时期河北女师范学院家政系学生生活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24(5): 36-42.
- [30] 金一虹. 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性别议题——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J]. 妇女研究论丛, 2006(2): 43-50.
- [31] 郭于华. 心灵的集体化: 陕北驢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4): 79-92, 205-206.
- [32] 杨菊华, 何焯华.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J]. 人口研究, 2014, 38(2): 36-51.
- [33] 王永颜. 中国家政学学科的发展基础与未来期待[J]. 河北学刊, 2023, 43(3): 15-21.
- [34] Virginia B V. Home economics move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Sarah S, Virginia B V. Rethinking Home Economics: Women and the History of a Profess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301-315.
- [35]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 燕京大学史稿[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284-285.
- [36] 林如萍. 深耕在地: 台湾家政推广的发展与展望[J]. 农事推广暨台湾农业推广学会60周年专刊, 2015: 58-71.
- [37] 陈朋. 美国家政学学科百年发展述评[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5, 27(2): 123-128.
- [38] Fernandez N P. Review of rethinking home economics: women and the history of a profession[J].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99(3): 548-550.
- [39] Boris E. Review of rethinking home economics: women and the history of a profession[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98(1): 278-279.

Stigmatization and Legitimation: a Historical Debate 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Home Economics in China*

MAO Lidan, LIU Ai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the historical debate of professionalism reflects the basis of legitim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of home economics,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ome economics, and also had a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ome economics. There are mainly four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ome economic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me economics was transplanted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At this time, professionalism of virtuous wives and good mothers was competing with professionalism of social servi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fessionalism of virtuous wives and good mothers was criticized, and the discipline of home economics was cancell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ommercial professionalism has arisen and the discipline of home economics was rebuilt. The basis of the legitimation of home economics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cluding: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scientific household and scientific life in the knowledge view; femal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female elites in the gender view; public orient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ethic view,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social service, economic valu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stigmatization basis of home economics also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view of knowledge, it shows empiricism; in the view of gender, it shows the cultivation of virtuous wives and good mothers, and gender stereotype; and in the view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t points to the private fields such as family or individuals, and class privilege. At present, China's home economics has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economics needs to realize the destigmatiz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That is to say, in terms of knowledge view, it needs professional and integrated knowledge to break the empirical stigma; in terms of gender view, it needs gender sensitivity to break the gender stigma;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t needs public and social ethics to break the private stigma.

Key words: Home Economics; professionalism; professional stigma; professional legitimacy